

《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3集

孙中山与华侨

—“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研究论丛》第 13 集

孙中山与华侨

——“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与华侨 / “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 . —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 1996.10

ISBN 7 - 306 - 01193 - 6

I . 孙 … II . 中 … III . ①孙中山研究 - 华侨史 - 论文集
②华侨史 - 孙中山研究 - 论文集 IV . C 5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4.5 万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1100 册 定价 : 15.50 元

在“孙中山与华侨国际美术展览” 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开幕典 礼上的讲话

姚美良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今天，由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书画家参与共同创作的“孙中山与华侨国际美术展览”，以及“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在此隆重举行，我谨向与会的各级领导、艺术家和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中山先生是对海外炎黄子孙有着巨大感召力的中华民族先进代表。我出生于海外，童年是在海外度过的。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到过海外各地从事革命活动。在老一辈华侨中，孙中山先生是特别受到尊崇的历史伟人。先父永芳公就多次参加和主持过华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集会，至今还保留着照片。每当我看到这些照片，先父当日向我们兄弟讲述孙中山先生救国事迹的情景，就历历如在目前，我心中便涌起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感。我虽然服务于工商界，但一直希望为弘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尽一点心意。这也是1990年以来，我捐资创办“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连续举办三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多次往来于大陆、台湾和海外各地，所到之处，一谈起孙中山，大家就有很多共同语言。这使我深深感到，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确实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

纽带。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已为期不远，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作为第三代的华侨，作为全国政协的华侨委员，应该为促进祖国的统一、促进海内外华侨华人的交流合作尽绵薄之力。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在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活动中，各地华侨始终如一地支持由他领导的革命事业。我们的美术作品展选择“孙中山与华侨”这个主题，不仅可以反映孙中山先生为救国救民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而且可以体现华侨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体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血肉联系。这次美术作品展将在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华侨华人较多的地区巡回展出。我们相信，此次展览将有利于发扬前辈华侨关心祖国前途命运，为振兴中华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将有利于团结海内外华侨华人，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共同努力；将有利于促进新一代华侨华人对乡邦的理解和关心，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热爱乡邦的感情；同时，对海峡两岸以及海内外华侨华人的交流与合作，也将起到促进作用。

感谢参加这次美术作品展创作及学术讨论会的海内外艺术家和学者，你们用不同形式再现出来的感人形象，将使炎黄子孙在重温历史画卷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感谢各级领导、各方朋友对这次美术作品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的支持和合作！

谢谢各位！



姚美良先生在“孙中山与华侨国际美术展览”暨
“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讲话。左起
林若(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原广东省人大主任)、姚
美良、王珣章(中山大学校长)、王维(原广东省人大
副主任)

目 录

在“孙中山与华侨国际美术展览”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姚美良	(1)
华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		
——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锡祺	(1)
孙中山时代华侨的祖国认同	罗福惠	(4)
试论华侨支持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文化背景		
——以南洋及美洲华侨为中心	陈胜彝	彭 鹏 (31)
清末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与辛亥革命	庄国土	(51)
孙中山与华侨在反清革命中的互动关系	林家有	(72)
孙中山的华侨观与华侨华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杨万秀 (99)		
新加坡华侨与庚子勤王运动	桑 兵	(110)
海外华侨对康梁及保皇会态度的演变	郭景荣	(135)
辛亥革命后期革命党人与华侨的关系	邱 捷	(152)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孙中山与华侨	段云章	(171)
孙中山与美洲华侨	马庆忠	(192)
加拿大华侨与辛亥革命	张应龙	(210)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越南华侨	周兴樑	(223)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与印尼华侨	温广益	(241)
孙中山与缅甸华侨	余定邦	(258)
南洋华侨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贡献	陈树森	(276)

孙中山与横滨华侨冯氏昆仲	李吉奎	(287)
广西籍华侨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贡献	赵和曼	(302)
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邓泽如	张海英	(314)
孙中山与黄三德		
——兼评黄撰《洪门革命史》	王禄斌	(332)
伍廷芳与中美侨务交涉	梁碧莹	(355)
孙中山与海外香山人	胡波 林有能	(372)
孙中山五则史料辨析	余齐昭	(391)
孙中山为华侨题词题字辑注	刘望龄	(406)
后记		(432)

华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

——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锡祺

今天早上，由爱国青年实业家、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倡议、主办的《孙中山与华侨》书画展，已经举行了开幕典礼。现在，我们又举行这个学术研讨会。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在座诸位一样向大会提交论文，只能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近代中国，国势积弱，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侵略之下，中国濒于亡国灭种的险境。孙中山目睹时艰，立志救国，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从1894年起，孙中山为实现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使中国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坚持不懈地奋斗了30多年，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始终是他的事业的积极支持者。

孙中山是依靠华侨开始其革命活动的。他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就得到檀香山等地华侨的大力支持，在最早的会员当中有不少是华侨。从兴中会开始，经过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直至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的党一直都有大批华侨党员；在世界各大洲华侨聚居地，建立了很多组织机构。孙中山为了领导革命，足迹遍留亚、欧、美洲，他特别重视在华侨当中进行活动，而华侨志士多为血性男儿，在孙中山的感召下投袂而

起，纷纷参加革命。有的创办革命报刊，宣传孙中山的思想与主张；有的设立筹款机构，为革命事业提供经费；有的亲临战阵，拼搏于枪林弹雨之中，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回顾辛亥革命过程时写道：“综计诸役，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在这里，孙中山特别强调了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但在革命党人、在学界、在会党当中，本来就有不少华侨人士；1916年他在给海外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中就盛称“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历史已经证明，华侨对孙中山的各个时期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最全面的支持，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孙中山也一直对华侨的贡献予以极高的评价。

说到华侨对孙中山的支持，我们往往会特别注意华侨的“慷慨助饷”，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华侨对孙中山的经济支持是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辛亥革命时期十次武装起义，所需经费大部分来自华侨的捐助。华侨中小商人以及华侨中的劳苦大众，把自己辛勤所得的一点血汗钱拿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甚至不惜毁家纾难，在史册中留下了很多动人的篇章。待到武昌起义爆发后，上层华侨也纷纷支持革命。据统计，武昌起义后四个月内，各地华侨支持革命的汇款达数百万元，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汇给孙中山的。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孙中山在领导反袁、护法期间，继续得到华侨在经济上的支持，数目也很可观。海外华侨社会还是孙中山进行革命起义可靠的后方，除提供军饷之外，转运军械等后勤保障工作也主要通过华侨进行；当起义遭受挫折时，海外华侨社会又是革命党人流亡避难之所。民国以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因为要维持政府与军队，自不可能靠华侨捐助作为主要的财政来源，但华侨在经济上、政治上

的支持，始终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华侨密不可分的关系。

孙中山在少年时代即生活在华侨社会之中，对华侨的疾苦、要求与愿望有深切的体会和了解。他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又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持。因此，他在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过程中，始终关心华侨的利益，努力改善华侨的处境，提高华侨的地位。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尽管孙中山的处境极为艰难，但他仍颁布了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的法令，并关注表彰华侨当中的有功之士。1916年，讨袁战事刚刚结束，他就向全国同志提出偿还华侨债券的问题，并委派廖仲恺向北京政府交涉。孙中山在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他的伟大人格，他与华侨血肉相连的关系，使他在华侨社会中受到普遍的景仰与崇敬。

华侨远离祖国，常怀祖先庐墓之思。海外华人族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产物。今天，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已经走过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路程，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但是，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的意识，仍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之中。海外华侨华人当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旨在中华的崛起。现在，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已经实现了。一个初步繁荣、稳定强大的中国，屹立在东方，成为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保障。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程。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仍然有着现实意义。海外华侨华人，在致力于所在国建设的同时，努力弘扬中华文化，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国家统一大业，这可以说是华侨华人先辈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续。因此，研究“孙中山与华侨”这个课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现实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学术研讨会，“孙中山与华侨”这个课题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孙中山时代华侨的祖国认同

罗福惠

在既往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有关华侨的若干问题、尤其是爱国华侨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情形，已有充分研究。本文拟对已有研究略作综合并扩大范围，围绕着当时华侨的祖国认同问题，包括塑造和影响这种认同的主要因素、华侨的祖国认同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等，作出初步探讨。时间范围限于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这一段。

(一)

“认同”是近几年从境外传入的众多新词汇之一，目前已基本为我们学术界所接受并广泛使用，诸如对族群、文化、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学说、团体组织、政党和政权的认同等等，而处于核心位置且不可回避的问题乃是祖国认同。

群体和个人的祖国认同，是在历史认知、现实感受和未来预期这三个因素的互动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对于世代居住于国内，在国家政权的有效管理中生活的人们，其祖国认同显然不会有什么障碍，无论是皇权制度下的子民还是近现代国家的国民，都得对国家政权尽力和效忠。即使是发生了政权更迭，有的群体或个人因经济利益、文化信仰、政治主张等不同，把前政权的覆

灭视为“亡国”，以“遗民”自居，拒不认同新的政权。但用科学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亡国”是狭义的，其实质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被新的朝代和政权所替代，这种内部的革故鼎新并未造成广义的真正的“亡国”。而且国家政权具有最巨大的强制功能，不论群体或个人愿意与否，都必须遵守国家政权的制度和法令。随着国家各种政策的贯彻实施和调整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重新整合，再加上时间推移，新陈代谢，因而其先并非自愿也不巩固的国家认同，会逐渐成为人们自愿而稳固的理念。清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初，曾遭到汉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剧烈反对，但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后，对清王朝为主权代表的国家认同就不再被多数人质疑，原因就在于此。当然，随着清王朝的腐朽式微，其利益分配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它不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由对现状的不满发展为对前途的不同预测和期待，对现实国家政权的认同就再度形成歧异。清末的“革命”和“保皇”的论争，就是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有了不同的理念。当然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是中国人，他们的祖国认同是一致的。可以说，祖国认同是侧重于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观念，国家政权认同则是侧重于现实的政治的管理的观念，二者略有不同，但在多数时候又是重合的。

华侨的情况和国内人民有所不同。虽然在移出之初，塑造其历史认知的诸因素如种族血缘、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礼仪信仰等均与国内人民相同，但其后由于杂居或混血，由于接受异质文化和疏离原有文化，其历史认知难免在程度上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现实感受上，因为祖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无法施及，华侨的处境首先取决于侨居国的环境及当地政府的态度，祖国政府的作用退居其次；他们对祖国的关怀也只能凭其自愿而无法强制。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华侨既认同祖国，同时亦认同侨居地的国家政权。如果说，同样是历史认知、现实感受和未来预期

三者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祖国认同，那么对国内人民来说，三者互动是在国家与人民两方面之间进行；而对华侨来说，则是在祖国、侨居国和华侨三方面之间进行。

欧美列强也有对外移民，其早期对美洲、澳洲和东南亚系采取武装殖民，移民受到保护自不待言；19世纪中期以后的来华侨民，或有经济基础，或有文化技术，或有宗教组织背景，并都得到各国政治的、外交的甚至军事的保护，享有高出于当地人民的种种特权，他们不屑于融入侨居地的社会，其祖国认同也不会发生变化。但中国移民的情况不同，综观整个清代和民国初期十余年的华侨，除了因为政治原因而出亡的人物之外，绝大部分是家境贫困的劳动者和无权无势的下层人士，一些后来成为巨富的华侨，初出国时也是工人、店员或小商贩。而当时的缙绅之家、仕宦之人和家境富有者是不会冒险犯难，抛弃优裕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到异国他乡胼手胝足地谋生和创业的。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由于美国开发加州金矿和修筑中西部铁路，同时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开发都需要大批廉价劳力，清政府被迫放松了对人民出国的控制，于是东南沿海尤其是闽粤两省人民大批出洋。据《东方杂志》的调查统计，1907年的华侨总数为630余万。^[1]而且此后华侨和取得外国籍的华人人数一直在迅速增加。

19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清政府先后实行的是“禁海”措施和隔离政策，移民出国难，归国亦不易，故华侨犹如弃民，完全失去了祖国的保护。从17世纪初到1820年，在菲律宾的华侨6次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大规模虐杀，中国政府均未过问。西方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政府一方面摧残华侨，一方面对当地土著和华侨采用分而治之和以华人治华人的政策，如在缅甸的华侨可以担任军官；在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州、印尼等地则有华人被任为“甲必丹”、“玛腰”和“雷珍兰”（均为华人社区的领导职务）。再加上其初很长时间侨居地没有侨校和华文传播工具，中

国女性出洋者极少、华侨和当地居民通婚等多种原因，使得移民时间较长的华侨祖国观念渐渐淡薄。19世纪末期曾游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王大海曾记云：“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声教，语番语，衣番衣，读番书，……奉回教，不食猪犬，其制度与爪哇无异。”^[2]这些人即所谓“土生华人”。土生华人的下层认同当地文化，上层则认同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教育，使用西方语言，充当市政委员等职务，担任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及公司董事或管理者等职业，他们视西方尤其是英国为“祖家”，不仅对中国事务不感兴趣，甚至鄙视中国和中国人。^[3]当然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而且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乃在清政府对华侨长期采取错误的隔绝政策。

但从19世纪后期起，华侨群体中同时也出现了祖国认同的显现和强化。此中原因甚多，而作为前提的条件是华侨人数增加，尤其是“新客华人”即19世纪中期及以后才移居的第一代华侨占较大比重。新侨离开祖国时间不久，对祖国和家乡的关注自然十分强烈；由于此期移民在国内仍属下层社会，多数人出洋时不可能举家迁徙，亦未必打算当永久移民；少数有传统文化功底者还回国应试（如漳州邱菽园21岁时回国中式举人）。从文献记载可以发现，后来支持甚至投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华侨，以新侨占绝大多数，一二代土生华人（即其父、祖辈才移居者）也占有一定比重，而移居世代更长的土生华人则很少见。同时，由于新侨中部分人略识中国文字，有的人在家乡时还是塾师和医生，他们的移民带动了华侨群体传统文化水平的提高，自1854年新加坡华人创办第一所侨校萃英书院之后，到80年代，各地开始出现侨校，华文报刊也在80年代开始涌现：新加坡有《叻报》（1881）、《星报》（1890），马尼拉有《华报》（1888）、《岷报》（1889）、《民义报》（1891），槟榔屿有《槟城星报》（1896）等。这些对于传播中华文化，让华侨更能了解国内国际

形势，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最能激发华侨的祖国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还是中国因遭列强侵略而面临的危局。华侨“无论贫富，都在中国发生对外战争时支持中国”。如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新加坡华侨拟设法焚毁法国寄碇于该港的军舰，表示他们对法国侵略者的仇恨；当地华侨领袖章芳林、吴翼鼎，马来亚吡叻州的“甲必丹”郑景贤等，共为福建加强海防捐款数十万两。甲午中日战争时，新、马等地的华文报纸相当关注战况和结局，一再发表“社评”，反对在屈辱条件下与日本议和，主张动员全国力量继续作战；对于《马关条约》规定的割让台湾，所刊文章均极力反对，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两年以后，马六甲就出现了以青年侨商沈鸿柏为首的名叫“救国十八友”的爱国组织，他们发誓要“共拯中国于沉沦”。^[4]远在檀香山的侨商邓荫南，亦因“甲午中日战起，感祖国之危亡，慨然有澄清之志”，因而对以“振兴中华”为奋斗目标的孙中山“心折之，订生死交”，成为兴中会初期捐资出力最多的骨干，并毅然回国参加了乙未广州起义。^[5]

其次，华侨在国外屡遭不平等不公正待遇乃至残害，使得其在渴望安全和尊严的心理驱动下，要求得到祖国的关怀和保护。在东南亚，殖民政府实行居留地通行证制，华侨行动缺乏自由，生命财产也没有保障。1907年，荷兰政府颁布荷属东印度（即印尼）“归化法”，一面企图割断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否则将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一面又规定种种苛刻的归化条件，诸如要曾服兵役、要会使用荷兰语言、要有一定数额的财产等，使华侨进退两难。即使是华侨中的富有者，也难免遭到盘剥和歧视，如华侨在马来亚经营锡矿，产品“价值悉听命于洋行”，无论本大本小者“同受其害”；华侨投资种植经济作物，出售时受洋商“抑勒”，“暗中损害实非浅鲜”。^[6]拥资数千万的侨商巨富张耀轩，乘坐德国轮船时就因为他是华人而不能坐头等仓，这给他很大的刺激，

从而决定自办轮船公司和回国投资。

在美国，自 1879 年颁布第一个排华法令之后，到 1903 年由国会通过的排华法令已达 15 个（各州立法未计），诸如一再拒绝中国劳工入境、审理诉讼案件时华人不准保释、非以劳工谋生的留居华侨一旦陷入贫困沦为劳工即驱逐出境等等，此外还有数十项“禁例”，使司法机关得以任意迫害华侨。^[7]美国各地争选票的政党政客、种族主义者及因失业而不满的群众，多次制造排华事件，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清末，共发生大小排华事件数十起，规模小者华侨死伤数人，房屋财产损失数万元；规模大者华侨死亡数十人，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更以数十万计。而且由于美国率先排华，加拿大、澳大利亚、拉美各国、东南亚的荷兰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亦相继效尤，少数后进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也在政纲和实际行动上排华。如 1911 年墨西哥内战时，徒利安埠（华侨多在此以种菜为业，称为“菜苑”）、坎茂利埠等地，华侨被杀数百人，被毁之银行、商店、栈房、住屋等财产无法统计。其实动乱之前已有风声，别国侨民均已由各国政府或使领馆安排船只暂避，华侨业已向清廷驻美公使（兼管墨西哥、古巴、秘鲁）求助，但驻美公使只是转而请求美国政府和驻墨西哥各埠领事，而届时各美国领事均以未获政府指示为由拒绝，于是华侨只能坐以待毙。^[8]

华侨痛苦且屈辱的遭遇使他们深感自己的命运与祖国是否强盛、祖国的政府是否保护他们密切相关。1904 年在新加坡的黄乃裳、陈楚楠、张永福等“每谈及移民国外之痛苦经验，每觉有如美国之黑奴；而论及国耻未复，每拔剑起舞，浑然忘年”。^[9]救国和报国之心油然而生。

塑造和影响华侨祖国认同的关键因素，乃是祖国政府和政治领袖对待华侨的政策、措施和态度。有关这些情况，本文接下来将从清政府及保皇党、孙中山先生两个方面展开分析。